

清代徽州棚民的结构组成与基层社会生态

——以清代嘉庆年间休宁县左垄村土棚互控案为例

卞利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 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文章根据新发现的《休宁县三十三都五图左垄村土棚互控案卷》，以左垄村土棚互控案件处置为中心，对清代徽州棚民群体的结构性组成特征及其资金来源进行分析，并结合地方官府和基层社会生态，探讨清代徽州地方官员突发事件的应急应变能力。研究表明，棚民群体由棚头和雇工组成，并非皆为富裕农民，棚头才是富裕农民，广大棚民即雇工其绝大部分是贫困阶层，一般棚民亦较为普遍。整个棚民群体具有地域性、宗族血缘性和较强流动性等特征。包括对棚民在内的突发事件处置，尽管事关当地官府和基层社会生态，但主要地方官员的担当干练才是考验其应急和应变能力的关键。

【关键词】清代；休宁县；左垄村；土著与棚民；诉讼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3-0112-15

The Structural Composition and Grass-Roots Social Ecology of The Structure and Basic Social Ecology of Huizhou Shedpeople in Qing Dynasty: The Case of Mutual Control of Soil Shed in Zuolong Village of Xiuning County During Jiaqing Dynasty is Taken as an Example

BIAN Li

(Key Research of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Based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documents of *Mutual Accusations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 and Shed People in Zuolong Village, Fifth Tu of Thirty-third Du, Xiuning County*, centering on the settlement of soil shed case in Zuolong village, the article analyzed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funds of shed people groups in Qing Dynasty, with a review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grass-roots social ecology. Their ability of responding and handling local emergencies was discusse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group of shed people was composed of shed people and hired workers, not all of them were rich farmers. In fact, the shed people were rich farmers, while the majority of the hired workers were poor, and so as the general shed people. The community of Shanmin was featured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regional, related by its clan and blood, and its strong mobility. Although the handling of emergencies, including with those of Shan-people, was a concern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social ecolog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 ability of handling emergencies for the main local officials and how they were supposed to react to them was the key to testing their capacity of management.

Key words: Qing dynasty; Xiuning county; Zuolong village; indigenous people and shed people;

[收稿日期] 2022-0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间规约文献集成”(14ZDB126)

[作者简介] 卞利(1964—)，男，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民间规约文献暨区域社会经济史。

有关徽州棚民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傅衣凌即从乡族集团对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干涉角度,对清代乾隆和嘉庆年间黟县棚民水口烧煤、租山开垦、种植苞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①。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学界又从富裕农民垦种山场经营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视角,对徽州暨皖南地区棚民经营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②,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包括徽州在内的清代“富裕棚民是资本主义租地人的先驱”^③之观点。90年代至今,随着吕小鲜整理编选并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名义刊发的馆藏嘉庆朝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④的公布,徽州棚民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批丰硕的成果。不过,这一时期对清代徽州棚民的研究,大多围绕棚民对徽州生态环境破坏、社会危机应对以及社会经济及其日常生活影响等主题展开,并公布了部分棚民文书^⑤。

然而,清代徽州地区棚民研究中,依然有不少问题未能厘清,诸如清代徽州棚民的资金来源、棚民群体组成的结构性特征与棚民个体的具体籍贯等问题,依然因史料的限制,未能有效展开。个别研究成果,因史料的欠缺,甚至还存在讹误问题。

本文拟以新发现的清嘉庆十七至十九年(1812—1814)《休宁县三十三都五图左垄村土棚互控案卷》所记录和反映的休宁县西南山区三十三都五图左垄村土著村民与棚民之间诉讼过程为中心,结合部分地区方志、各地处置棚民问题的碑刻,以及徽州土著及棚民的族谱和文书等资料,对清代徽州棚民群体的结构性构成、地方官府与基层社会的生态以及在处置棚民问题时的政策差异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希冀以此弥补清代徽州棚民问题研究中的缺环,澄清包括徽州在内的清代棚民问题研究中的是非曲直。

① 参见傅衣凌:《论乡族集团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之干涉》,《社会科学》1946年第3—4期。

② 参见冯尔康:《试论清中叶皖南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南开学报》1978年第2期;叶显恩:《明清徽州佃仆制与农村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4—85页;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35—138页;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4—135页。

③ 冯尔康:《试论清中叶皖南富裕棚民的经营方式》,《南开学报》1978年第2期。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⑤ 关于棚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1)刘秀生:《清代闽浙皖赣的棚民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2)赵冈:《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3)[日]涉谷裕子:《清代徽州休宁县における棚民像》,山本英史编:《传统中国の地域像》,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0年,第211—250页。(4)王振忠:①《生态与生计:清代深山开发与水土流失引发的纷争》,《徽学》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②《晚清民国徽州的日常生活与乡村治理——以稿本〈开检可观〉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5)谢宏维:①《清代徽州棚民问题及应对机制》,《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②《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乡村社会控制——以清代徽州的棚民活动为中心》,《中国农史》2003年第2期;③《清代棚民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6)陈瑞:①《清代中期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研究——以棚民营山活动为中心》,《安徽史学》2003年第6期;②《“止种兴养”:清乾嘉年间徽州宗族处置生态危机的应变之策——以祁门环溪王氏履和堂宗族为中心》,《中国农史》2021年第5期。(7)赵赟:《强势与话语:清代棚民历史地位之反思》,《中国农史》2007年第3期。(8)梁诸英:《契约与民生: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之反思》,《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9)葛旭:《棚民的土地利用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基于清代徽州地区的考察》,《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10)袁辉、彭奕菲:《以安徽休宁县租山纷争案为例看清代棚土纠纷的国家应对》,《法律适用》2018年第2期。(11)黄忠鑫:①《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歙县廿五都飞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1—140页;②黄忠鑫、王玉璐:《清代棚民的置产与入籍——基于徽州周家源文书的考察》,《中国农史》2022年第1期。(12)《现象与本质:清代长江下游山区玉米生产引发的社会环境恶化——以杭嘉湖和皖南山区为中心的研究》,《中国农史》2020年第4期。(13)郑小春:《苞芦种植与清代徽州山场开发及乡村生活——以祁门环砂程氏宗族为中心》,《中国区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

一、《休宁县三十三都五图左垄村土棚互控案卷》的发现及其学术价值

《休宁县三十三都五图左垄村土棚互控案卷》，不分卷，无页码，清抄本，现藏于安徽大学图书馆古籍室。原书封面及封底系以牛皮纸装订，经逐页统计共有86页，总字数（含标点）约4万字。该书封底粘有红字印刷的“北京市中国书店定价签”一枚，“书名栏”手书题名《状子底》，“编号”栏题“志字第2020”号。安徽大学图书馆线装书墨色书签题名《状子底稿》。据此蠡测，该抄本应系安徽大学图书馆采购自中国书店。书内正文第1页首行，顶格书有“大清嘉庆十七年（1812）二月廿八日，因方长相等旧冬盗拏土名箩篾坎等号山场，今正察觉，曲从中处，揭债变产，备价缴退，故同”。“故同”后有手画“王有文书”印章一枚。由此推之，王有文应为该案卷的辑录者。

在该起诉讼案件中，以王氏宗族族长王光芳、王志汀等和方氏宗族族长方栢时、方长环，乡约王文灼、保长王祥瑞等为首的休宁县三十三都五图左垄村土著村民，呈控族内不肖支丁方长相、方长种、方长月三兄弟以及林村张东等贪图重金，盗捏方兴旺、王天立、王天进等名，将该村中方、王各姓众业和林村张东亦有部分产权的“贤”字等号土名箩篾坎、姨婆坦以及毗连土名青竹坞、石门坞山业共计9号山场，擅自租给棚民汤得万、陈义山（亦称程义山、吴义山，详见后文）、吴仓荣和吴玉堂等扫砍山木，种植苞芦，并请求休宁县等各级官府，遵照嘉庆十二年（1807）安徽巡抚初彭龄等奏准的《棚民退还山场章程》，驱逐左垄村棚民、拆除棚厂、退山回籍。汤得万、陈义山、吴仓荣和吴玉海等棚头，则以拒绝和拖延退山拆棚进行反控。

整个案件以嘉庆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王光芳、王志汀、王永汗、王世永，方氏族族长方栢时、方长环，约保王文灼、王祥瑞“为违例召异、公吁示禁、保课裕民、永杜后害事”^①，呈禀休宁县知县何应松恳请示禁为始，以王志汀等为首的左垄土著村民王氏和方氏宗族，先后40次呈禀至休宁县、徽州府、安徽按察司、安徽巡抚和两江总督府，其间历经休宁知县派差登山拆棚、棚民旋拆旋搭、放火烧棚、土棚互殴、重伤人命、屡结屡翻、结而复起等复杂过程。控案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前后卷入案件的土著村民、棚民（含棚民家属）、各级官员以及差役胥吏总数近150人，其中棚头陈义山、棚民储友成和盗租山场给棚民垦种之左垄土著村民方长相、方长种和方长月三兄弟，有3人在土棚争斗中丧生。直至嘉庆十九年（1814）二月二十日，所有山棚被拆毁、棚民被驱逐退山回籍而告结束。这一诉讼案件是继嘉庆十二年二月十四日休宁县二十三都二图浯田岭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遣抱告程怡仁以“棚民方会中等纠集多人、踞种山场、逞凶酿命等情”，“阖邑士民为此攒凑盘费”，赴都察院“京控”、恳求驱逐棚民案件，促成安徽巡抚初彭龄《棚民退还山场章程》制定与颁行之后，休宁暨徽州境内发生的又一起规模较大的土棚诉讼案件，其曲折复杂程度及对清朝中央政府处置棚民政策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亚于程元通遣抱告程怡仁赴京具控案件，它直接影响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处置包括休宁暨徽州在内的棚民问题的决策，促成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御史孙世昌《严申议准徽州府棚民限满退山回籍章程》的制定与实施，对道光四年（1824）安徽省《查办皖省编设保甲》事宜，亦具有重大影响。

由于该书夹藏于安徽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众多普通古籍之中，且因编目题名欠准确，故从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利用。它的发现，弥补了嘉庆十二年至嘉庆二十（1807—1815）年间清王朝处置棚民政策阶段性变化研究问题的缺环，对清代包括徽州府在内的皖南地区普遍存在“召异租佃，效尤不息，讼牒繁兴”^②

① [清]王有文辑：《休宁县三十三都五图左垄村土棚互控案卷》，不分卷，清抄本。为节省篇幅，以下凡引自该书的引文，不再一一注明。

② 《清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祁门县严禁召异锄种挖桩等告示》，引自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二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的土棚互控、棚民群体的结构性组成,以及棚民资金来源等问题等研究,具有弥足珍贵的重要学术价值。

二、左垄村土棚诉讼的起因及徽州棚民的结构性组成

清代休宁县三十三都僻处休宁县西南山区,位于新安江正源六股尖山麓的五股尖之北山脚下,与徽州府祁门县、婺源县及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毗邻,境内群山耸立,植被茂密,在休宁全县三十三个都中位居最后一都,故在该起诉讼案卷中述及居住地时,当事人往往自称“僻处末都”。三十三都共有五图,其中五图所在的左垄村,向是王氏和方氏二大宗族的共居村,与本图冯村、林村、右垄及一图郭源村方氏宗族山场相连,在乾隆中期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之前,这里“山多田少,贫民全赖山场蓄养竹木供课聊生”,社会相对较为安定。

嘉庆十六年(1811)八月,左垄村方长相伙同兄方长种、方长月,在林村惯召棚民之张东等串通与撮合下,假捏左垄村方氏宗祠兴旺堂之号,伪造方兴旺、王天立户下支丁方相、方全及王天进等人名,出笔立据,将左垄村方、王二姓共有之“贤”字号土名箩篾坎等三号“税数百余亩”山业,以寄庄酒水银800两正的价格,盗拊于棚民汤得万拔种杂粮,蓄养苗木,“在山茶柯、桐子,听客取收,村人不得采取”,议定年限从嘉庆壬申起至道光丙戌年(1812—1826)冬为止。其所立《议给蓄苗笔据》全文如下:

立议给蓄苗笔据人方兴旺、王天立户下支丁方相、[方]全同王天进等,情因我等住居末都,山多田少,衣食皆赖于山。除属山业蓄苗取利者多,惟我等山荒,深虑衣食无措,是以合族商议,将承祖山业土名苦竹坞、又土名箩篾坎、又土名杨梅岭,上至山脊,下至大河,外至朱家坑熟山为界,里至里辛坑熟山为界;又土名里公冲,又土名苦蔗坞、大石门、小石门等号,上至山脊,下至大河,外至东山隘为界,里至右垄熟山为界。其四至之内,生熟地柴木在内,大、小仔坞在内,四至明白,凭中六人明议,给与汤得万客名下翻种杂粮。三面议定寄庄酒水银捌百两正,曹平足论。自壬申年种起,至丙戌年冬间为止。自给蓄之后,听客起棚,各族永无饰说。倘有内外人等异言,尽是出笔自理,不干客人之事。在山坟墓,照原境蓄养,问后兴蓄苗木,每窠长养。二支在山茶柯、桐子,听客取收,村人不得采取。设有不合,礼取出笔理论,不得推诿。恐口无凭,立给蓄苗笔据,付客人收执为据。

嘉庆十六年八月 日,立给蓄苗笔据人方相、[方]全、王天进。

中见郑国宽、凌松栢、张锦文、程玉春。

遵依代笔詹大鹏。

以上均押。

当年十二月,棚头汤得万等带领百余棚民入山搭棚开种。次年正月二十五日,汤得万等再率众登山起棚。王氏宗族族长72岁的王志仃等发觉后,立即联手同为72岁的方氏宗族族长方栢时等王、方二姓6名族人,向乡约王文灼和保长王祥瑞紧急投告,并遍谕亲友出面理阻,同时劝令方长相及左垄村民备价赎回拊批,棚民退山还业,事遂暂息。

然而,嘉庆十七年二月,方长相又故伎重演,再次以方兴旺堂支丁名义,书立《给扞蓄苗木笔据》,将承祖荒山土名箩篾坎、苦蔗坞、姨婆担四至内大小仔坞土名、生熟地土、所有柴薪等,凭中王仲明、王来九,以进山寄酒水银400两正,出拊于棚民陈义山兴养杉苗,议定年限自嘉庆壬申年至道光戊子年(1812—1828)。《笔据》全文如下:

立给扞蓄苗木笔据人方兴旺堂支丁方长相等,因我等住居末都,山多田少,衣食皆赖于山。奈我等人力不杰,因荒芜数年来衣食无措。是以合村商议,将承祖荒山土名箩篾坎,上至山脊,下至河左凭朱家坑熟山,右至里辛坑熟山为界;又土名苦蔗坞,上至山脊,下至河左至右

壅熟山,右至东山障直下为界;又土名姨婆担,上至山脊,左、右俱凭大障直下,二至柴相村为界。各四至明白。内大小仔坞土名、生熟地土、柴薪尽在无遗。凭中出给与陈义山客名下兴蓄杉苗。自壬申年起,至戊子年为止,期满交山还东。在山茶柯、桐子、杂粮,听客兴蓄取利,村人不得侵害;在山坟墓,照原界蓄养。今奈家贫月歉,央中得受进山(记)[寄]酒水银四百两正,亲领□分。自给之后,倘有内外人等异说言,出笔人理涉,不干承扞[人]之事。恐口无凭,立此付陈收执为据。

嘉庆十七年二月□日,立给插苗木笔据人方长相。

凭中王仲明、王来九。

依口代书李有得。

以上均押。

以上二纸蓄苗笔据挤约的签订,以及随后百余棚民进入箩篾坎等处山场搭棚垦种,引发了当地土著村民的强烈反弹。王志仃等族老出面捐款筹钱,准备赎回被方相、方长相等盗挤的箩篾坎等处山场,并投报约保,请求休宁知县何应松颁发告示予以严禁。但赎回山场的要求遭到已逃匿隐身的方长相断然拒绝。无奈之下,嘉庆十七年三月十四日,王光芳、王志仃、王世永、方栢时等遂以“为藐示召棚、凶制强垦、毒害无休、课命莫保事”为题,呈禀休宁县,恳请知县何应松迅赐籤拘,赏讯究逐。同日,乡约王文灼、保长王祥瑞亦以“事干盗挤强种,诚恐日后酿成命案,貽累匪轻”为词,黏附方长相等所立甘约,呈请何应松,要求速拘案犯严究,并驱逐棚民退山回籍。王光芳等及乡约王文灼、保长王祥瑞的投词,开启了长达2年之久的与左垄村土著村民汤得万、陈义山和吴仓荣等为首棚民之间诉讼互控的先河。

从上引二件给蓄苗笔据的招租山约中,我们不难发现,二份约据的出面承租人分别是客棚汤得万与陈义山。那么,汤得万与陈义山究系何人?籍系何方?身为何职?

据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十八日两江总督百龄责成安徽布政司勘讯,汤得万供称:“小的是桐城人,向在案下农种度日。嘉庆十六年八月,里有方长相向小的说,他家有号山场出挤。小的应允,就凭中出价挤受,登山起棚。当日,小的听说该山是村中众业,就不敢开种,收回赎价,将山退还。”循此线索,我们查阅到光绪《皖桐寿坟汤氏宗谱》,知汤得万系安徽省安庆府桐城县东乡浮山(今属安徽省枞阳县)人,为迁居浮山始祖仲奇公崇文公派第16世孙。汤得万,字锡荣,讳得万,生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娶该县县市方成有之女为妻,生有三子、四女,三子分别是永丰、永胜、永茂。其父祖世代均以农耕为生,并无显赫家世^①。从整个诉讼案卷内容来看,汤得万是这起棚民群体中的主角和领袖,先后在“贤”字十五号土名箩篾坎等处山场起棚9座,被原告具禀人王志仃等称为“棚头”或“棚棍”“棚匪”。受雇在汤得万手下种山的棚民有百余人之众,特别是自陈义山于嘉庆十七年六月身死后,其所雇佣的几乎所有棚民全部转附于汤得万名下。这样,汤得万手下实际拥有的棚民总数应不少于200人。至于其资金来源,案卷并无交待,但在嘉庆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呈禀中,汤得万自称:“向在祁邑,农种度生,与治壤路毗连。上年六月,有[方]长相向称,伊族商明将祖遗箩篾坎等处山业召种插苗,邀身同去看山立据,嗣于八月成议。”由是可知,汤得万应是先在祁门县开山垦种并积累了丰厚资金,在被方长相诱至休宁县左垄村,缴纳寄庄酒水银800两后,获得了苦竹坞、箩篾坎等处山场垦种权。就此观之,汤得万称得上是富裕棚民。

陈义山,又称程义山,原姓吴,案卷中亦有称“吴义山”者。据棚头吴仓荣供述,“小的是怀宁县人,程义山即陈义山,是小的下堂叔父。”又据嘉庆十七年六月八日吴仓荣呈状云:“身祖物故,所生两子,长即身父。家贫无度,祖母郑氏携幼子义山,改醮陈门,未育。义故依陈,已得一子,名三和,年甫十二,待养祖母,终年回宗。向贩土布,投治货卖。”据此可知,陈义山系因父早亡、母改嫁陈氏后,改随继父姓陈。

^① 光绪《皖桐寿坟汤氏宗谱》卷二十九《仲奇公崇文公派》,清光绪二年敦厚堂木活字本。

案卷中“陈”“程”不分,盖因发音不同所致。为便于统一,后文凡有称“陈义山”“程义山”“吴义山”者,除引录原文外,我们一概称为“吴义山”。查乾隆《皖怀梅冲吴氏宗谱》,知吴义山之父、吴仓荣之祖为吴地杰(1715—1789)。吴地杰生有二子一女,长吴理坤(1747—?),字如海,娶杨氏殿朝公次女(1753—),生有三子一女,三子依次为国上、国兴、国宾^①。其中第三子吴国宾(1781—?),字仓荣,即本案棚头吴仓荣,聘朱奉舞长女为妻。吴地杰次子理元(1761—1812),字如春,即吴义山,娶桐城三湾坂刘朋久长女为妻,生有一子一女,子国材即吴仓荣供状称之为“三和”者^②。吴义山在嘉庆十七年四月十五日的呈禀状中,自称云:“身籍怀宁,本属乡愚,向治卖土布,往来有年。祸因今二月,祁门遇长相,向称伊家有土名箩篾坎等号山业,召扞杉苗。”可知吴义山乃系往来祁门县与休宁县之间贩卖土布的商人,且历有年所。因其与方长相在祁门偶遇,受其蛊惑,遂以“山价四百两,已经付过二百两”,租挤箩篾坎等处山场,并招募雇工百余人“兴蓄取利”。吴义山在案卷中屡被称为“棚头”,且与另一棚头汤得万系同党,其租山所付资金,应为其经营贩卖土布所得。因此,与汤得万富裕棚民的身份不同,吴义山则属于依靠贩卖土布致富的商人。其实,类似的富裕棚民,绝大多数系棚头,即如嘉庆十二年二月休宁县浯田岭程元通遣抱告程怡仁“京控”所指的棚头安庆府潜山县方会中、王春林等,以租价银2600余两,开垦浯田、江田各岭山地约周二十余里,搭建92座棚屋,更是属于实力殷厚的富裕棚民^③。

在这起诉讼案卷所卷入的近150名当事人中,有名有姓的棚民即有30多人,除吴义山、汤得万和吴仓荣等棚头外,尚有吴姓棚民7人(含未成年棚民家庭成员人)、储姓4人(含储姓之妻)、何姓2人、陈、李、钱、张、凌、程等姓共6人。这一棚民群体暨左垄土棚互控案中的身份、地位、角色及其与汤得万、吴义山之间的关系,分别如下:

吴玉堂,即吴雨田。据其嘉庆十七年八月十六日自具甘结,称系“怀宁县民吴玉堂”,与吴义山为同族弟兄关系。吴玉堂是该起土棚诉讼案中仅次于汤得万、吴义山和吴仓荣的棚民主角,案卷中多次出现其为吴仓荣、吴义海等出具保状,且称其为“棚头”的文字。其与吴义山、吴仓荣等皆系梅冲吴氏同族亲属,但最初并非一伙,在吴义山等至休宁之前,其活动范围及生计是在休宁县东乡二十七都垦山兴种。

吴义海,安庆府怀宁县梅冲人,系吴义山族兄,曾于嘉庆十八年三月初八日赴安庆,往安徽按察司越控,为吴义山辩诬,声称吴义山并非病故,而是被“锁押班房,凌虐毙命”。徽州府暨休宁县虽屡催怀宁县将其押至休宁县收审,但“据怀宁县申报,吴义海患病,业经伊侄吴景堂抬送回籍,关移休宁县,就经传审”。而案称吴义海并未离开怀宁而到休宁受审,但十一月十六日休宁知县何应松亲临左垄,差保督押吴义海等往山拆棚时,吴义海就在现场。为此,王志仃在随后的控状中,愤怒地质问道:“督拆之日,差系现督义海拆棚,因何不将该犯带案?”可见这起案件之扑朔迷离和复杂诡异,亦足见吴义海在棚民群体中的地位和份量。

吴景堂,系吴义海之侄,即抬送病人吴义海返回原籍怀宁县医治之人。

吴国扶,案卷亦称“胡国扶”,系张东原招棚民群体中一员,后归附汤得万,在左垄村山场垦种。据王志仃嘉庆十七年五月初八日控称:“地棍张东向召棚民胡国扶、钱南阳、张朝山、凌松柏等老棚,与身山毗连,均与得万党插身强种。”

储友成和储老二,为怀宁县檀木冲人,系同胞兄弟,且各有家庭。储余氏为储友成之妻,储五十系储友成之子。储友成和储老二兄弟均系受雇于吴仓荣垦种箩篾坎等处山场的棚民,在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休宁知县何应松差保督押吴义海等拆棚之时,储老二手持尖刀,欲将其病妇刺死。储友成则在争抢物件时,被王永汗纵火烧伤,“头面、双手惨遭火焚”,不久“身染烧伤身死”。储余氏在十一月二十三日

① 乾隆《皖怀梅冲吴氏宗谱》卷二《乾股宗廉公支下派系》,清乾隆五十八年萃英堂木活字本。

② 乾隆《皖怀梅冲吴氏宗谱》卷三《乾股士毅公支下派系》。

③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控词中云：“氏夫急往抢物件，头面、双手惨遭火焚，保经见明，物件、食粮尽烧无存，苦不胜言。泣思氏与儿女，赖夫养活，今遭火焚，一家数口，嗷嗷无依。欲延医治，莫云无钱，且无栖身。”可见，储友成与储五十应为受雇于吴仓荣做帮工而维持生计的贫困棚民。

何焰广、何灵芝亦系棚头，籍贯不详。在王志汀等呈控禀状中，二人多次被同汤得万、吴义山、吴仓荣和吴玉堂等棚头并列，被指责为“违例串骗、复纠强占，应系雨田同夥健讼之人，久在境内滋扰。”

李有得，系棚民，籍贯不详。据嘉庆十七年六月廿八日王志汀等告县禀状中称，“前据程义山呈[方长]相伪约，代笔之李有得，均系棚党，一路神祇。”

李广田、陈少芳，亦均为棚民，但籍贯不详。据嘉庆十七年九月初四日吴仓荣呈控状云：“初二日午前，王永沛、王永汗、方大斗、方小斗、方珠等带领数十余人，蜂拥登山，施放烟枪，抢去苞芦约有百余担，伤其帮夥十余人。惟李广田、陈少芳受伤沉重倒地，余均赴躲。俟众凶回后，方敢归棚，被衣家伙，遭擄一空。”

根据以上聚集于休宁县三十三都五图左垄村部分棚民的简要考订和说明，我们不难发现，包括休宁县在内的徽州府棚民结构显示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地域性特征鲜明。清代乾隆中叶以后进入徽州山区进行开山垦种的棚民，主要来自于安徽以桐城、望江、宿松、怀宁、太湖和潜山等县为中心的安庆府地区，其地域性特征极为鲜明。嘉庆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分巡安徽宁池太广兵备道使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中称：“该民等籍隶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桐城等处，间有江西、浙江民人。”^①左垄棚民的籍贯与杨懋恬所称棚民群体的籍贯大体相符，而嘉庆初年，江西抚州棚民廖大有等承租祁门县三四都凌凤鸣堂和汪兆恭祀瓦瑶山、邵家坞西边山、大塘坞口等处山业^②，则是江西棚民在徽州垦山的典型代表。

第二，家族血缘性特征显著。同徽州一样，清代安庆地区的乡村社会亦呈聚族而居格局，龙游县知县黄秉钧在为《皖桐姜氏宗谱》所撰序中云：“吾乡为礼义旧邦，向多望族”^③，“一族之中，支分派别”^④。宿松县《齐氏宗谱》嘉庆十二年合族重修宗谱公序亦指出，“乾隆庚午秋，合族创修家乘，其分昭矣，迄今六十载，生齿益繁，流寓益广”^⑤。在这起左垄土棚互控诉讼案中，以吴义山、吴仓荣和吴玉堂等为首的棚头，皆属安庆府怀宁县梅冲的吴氏宗族成员。梅冲吴氏宗族始祖吴道富，系元末明初由江西鄱阳县迁徙而来，“起家以耕读，传家以勤俭，继继绳绳，迄今数百余年，子姓如椒实繁衍，居址如星散棋布。”^⑥自四世祖时析为乾、坤、震三大股，六世时再提分股派^⑦，吴义山、吴仓荣等同属于乾派宗廉公支派，吴仓荣辈后又从宗廉公支派细分为士毅公支派。梅冲吴氏宗族号称怀宁望族，所谓“梅冲皖派之名区也，吴氏梅冲之望族也。”^⑧至乾隆中叶后，由于人丁繁衍益众，为谋生计，梅冲吴氏宗族大量向外迁徙，“今子姓繁衍，散居于潜[山]、太[湖]者有之，徙居于舒[城]、霍[山]者有之，远徙于陕西、浙江者有之。”^⑨吴义山和吴仓荣等往外谋生，大概亦在此时或不久后，且吴义山系随其母改嫁于陈氏后先入祁门，以贩卖土布维生并最终致富。从贩卖土布，到与侄吴仓荣等梅冲吴氏宗族成员共为棚头，出拚方长相等左垄村箩篾坎等处山

①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② 《嘉庆二十二年祁门凌氏〈合同文约誓契簿〉》，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十一，1993年，第260-262页。

③ 光绪《皖桐姜氏宗谱》卷一《序》，清光绪十九年余庆堂木活字本。

④ 民国《操氏宗谱》卷首《序》卷首《原序·十四孙操道江序》，1948年，怀宁敦叙堂木活字本。

⑤ 民国《齐氏宗谱》卷首《嘉庆十二年重修序》，1941年博物堂木活字本。

⑥ 乾隆《皖怀梅冲吴氏宗谱》卷首《序·清乾隆五十八年十三世孙吴文盛序》。

⑦ 乾隆《皖怀梅冲吴氏宗谱》卷首《凡例》。

⑧ 乾隆《皖怀梅冲吴氏宗谱》卷首《序·清乾隆五十八年许鲤跃序》。

⑨ 乾隆《皖怀梅冲吴氏宗谱》卷首《序·清乾隆五十八年吴凤序》。

场,并招募同乡雇工百余开垦山业,种植苞芦等,形成了地缘上同乡(同属安庆府)和血缘上同族相结合的棚民群体。而来自同为安庆府怀宁县檀木冲之储友成则以兄弟、夫妻和子女构成小家庭,成为棚民群体中又一种组成结构。

第三,较强的流动性。棚头和庞大的棚民群体并非固定居于某处,而是流动的劳动大军,“随时短雇帮夥工人,春来秋去,往返无定,多少不一”^①。棚头亦非纯粹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剥削者,他们需要承担各种风险,或因被强行拆棚驱逐而血本无归,或因土棚互控互殴而承受牢狱之灾甚至丢掉身家性命。他们穿梭奔走于官府与土棚之间,应对当地官府、差役和本地村民地棍的敲诈勒索,以及宗族、约保的诉讼乃至武力威胁与争斗。棚头的流动,当然有追逐更高利润的因素。如吴玉堂与同族吴义山、汤得万和吴仓荣等棚头,原非同伙。吴玉堂在嘉庆十七年七月十三日所呈《具结状》中,自称“身投廿七都,佃种田亩,已经数十载,守分安业”。廿七都位于休宁县东乡,与吴义山、汤得万、吴仓荣等承租之休宁西南山区三十三都五图左垄等处山场相距一百数十里,王志汀等之所以呈控其与汤得万串骗强垦等情,主要是吴玉堂“因身往东乡,回归中途遇雨,投宿饭店,得逢故乡[汤得万],不无叙谈。不料王姓同住店,暗拟牵诬身名……切陈义山又随母下堂,系身族弟兄,呈批投讯,在城患病身故,奉唤尸亲具领。有伊亲侄吴仓荣等,同山子遵唤赴案,具领棺埋。志汀称身拾股附本,察实,愿甘结罪。”吴玉堂之《具结状》固然有开脱不实之处,但其在吴义山、汤得万和吴仓荣等进入休宁县租垦山栽种之前,即已在休宁县东乡二十七都佃种山业,却是不争的事实。吴玉堂同吴义山、汤得万和吴仓荣并非如王志汀等所指控的“棚伙”关系。但在吴义山、汤得万和吴仓荣等棚头进入左垄垦山开种后,作为吴义山的同族兄弟,吴玉堂与其合伙结党,既有亲族抱团取暖的意蕴,亦有追求更大利润的因素,这应是客观实情。至于张东召租的吴国扶、钱南阳、张朝山和凌松栢等老棚,且垦种的山场本来就与箩篾坎等处山业相邻,其流动和归附汤得万及吴义山等棚民队伍,显然是出自其自身安全与利益诉求。正是棚民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流动性特征,使得自雍正三年(1725)以来清朝中央政府《江西、福建、浙江三省安辑棚民事宜》^②、嘉庆十二年安徽巡抚臣初彭龄《棚民退还山场章程》^③、嘉庆二十年(1815)浙江《棚民安插章程》,甚至道光四年“棚民编设保甲”谕旨,以及道光二十三年(1843)清廷再次奏准对徽州等地棚民“委员编设棚头,发给门牌,除历年已久,确有册籍可凭者,免其驱逐外,其新添之户一概逐令回籍”等处置棚民政策^④,很难得到执行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当然,在左垄棚民群体的构成中,棚头及其家族成员和一般雇工呈现出贫富悬殊的特征,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相对而言,作为雇主的棚头及其家族成员的汤得万、吴义山、吴玉堂和吴义海等显然属于富裕棚民阶层,他们的资金来源或出自较早垦山种植所得的原始积累,或源于经商所获利润。他们所雇佣的总计约200个棚民,则多系靠出卖苦力维持生计的雇工,“棚民皆外来无籍之人,其平素本不可知,耐作苦似甚贫,挟重货又似甚富。”^⑤而像聚居于浯田岭等村的棚头潜山县方会中、王春林一次性投入2600余两白银用于租山开垦资金,并拥有600多雇工。限于史料,我们尚无法判断其资金的来源,但方会中、王春林等棚首为富裕棚民,而雇工却是并不富裕的棚民,确是不争的事实。在祁门县三四都八保,来自相对分散的棚民,则多是以个体方式承租聚居于此的“汪、黄、凌、江四姓”之“律”字号山

①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② 《清实录》第七册《世宗宪皇帝实录(一)》卷三十四,雍正三年七月辛丑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514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第25-27页,《安徽巡抚初彭龄为休宁县浯田岭等七处棚民已拆棚退山事奏折》《安徽巡抚初彭龄为酌议棚民退还此场章程事奏折》。

④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五十八《户口·流寓异地》,清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

⑤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场,或进行林木砍斫,“作货出水”^①,或于此垦殖山场、种植苞芦、烧炭垦殖。在这些棚民个体中,既有来自与祁门毗邻的宁国府青阳县徐永成、诸天仁、诸天榜、方子先、牛成龙,亦有本县十二都新依之棚民胡以万,还有来自安庆府潜山县的棚民陈敦仁、王怀文、储攸同、许正明等,更有来自江西抚州的廖大有和江西方姓客棚,以及福建的三茂等棚民,其承挤的租金最多白银十余两,最少则仅有铜钱数百文^②。显然,祁门县三四都八保的棚民贫富悬殊不大,我们可将其视为一般棚民。

三、左垄村土棚互控案件的处置过程

同徽州府属其他各县一样,乾隆中叶棚民大规模进入休宁县山区进行无序开采和垦种苞芦等农作物后,给当地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破坏^③。早在乾隆中叶以后,休宁县几任知县就应当地土著村民之请,颁布了严禁棚民开垦的告示,其中嘉庆十二年初76岁族长程元通遣族人程怡仁“以案拖四载,祸酿数命”赴京越控的浯田岭土棚纠纷,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月,休宁知县郑泰即已颁布过告示,严禁“各业主不得贪利将山召租棚民开种,棚民人等毋垂涎勾串租”^④。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歙县、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五县知县皆于此时次第颁布严禁当地土著村民盗租山场与棚民开垦耕种,且得到当地宗族、士绅等群体的响应,共同应对棚民入山垦种事件之时,休宁县则除当地宗族和乡绅被动应对不断涌入的棚民之外,并无多少后续举措。嘉庆八年(1803)十月,休宁知县曾守一再次应浯田岭程氏族人请颁布告示,声明“如有不法之徒,故智复萌,混将山业私召异民入境,搭棚开种苞芦,为害地方者,许该处地保山主邻佑查实,指名禀县,以凭立拿究,决不宽贷。”^⑤然而时间过去了四年,仍无丝毫进展。与此同时,棚民却越聚越多,“驱逐为难,数载以来,骚扰不宁,以致程金官敬于义愤,误伤程金谷毙命,程柏又遭押毙,匿尸不交,程靳被匪捆归山棚,尚无下落。棚匪方博仁又枪毙吴二宝一命,经县起获凶器,现未结案。”^⑥浯田岭程氏宗族村民再也无法忍受,忿然以“族长程元通出名,祠堂公费内给与盘费,令程怡仁进京赴都察院具控”^⑦,出现了轰动一时“京控”事件。

同样,嘉庆十七年左垄村这起土棚互控案件,本来亦可在休宁县境内及时有效化解,但知县何应松在应左垄聚居的王氏与方氏宗族族长王志仃、方栢时、方长环,以及约保王文灼、王祥瑞等之请颁布禁示后,便以为万事大吉而未采取跟进之举,以致嘉庆十七年三月十四日王光芳、王志仃、王世永、方栢时等第一次具禀状告“匪徒方长相同兄长种、长月素行不法,旧秋魃将合村养命山场,伪造方兴旺、王天立、天进出名立笔,盗挤与棚民垦种”,请求迅速赐签,拘捕事发潜逃在外的方长相、方长种和方长月等盗挤主

①《清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二日青阳县棚民徐永成立承挤约》,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十一《嘉庆二十二年祁门凌氏〈合同文约眷契簿〉》,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20页。

②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十一《嘉庆二十二年祁门凌氏〈合同文约眷契簿〉》,第226-279页。

③参见卞利:《清代中期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影响》,倪根金主编:《生物史与农史新探》,台湾万人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335-352页。

④《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宁县知县郑泰严禁召棚民种山宁民杜害告示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龙田村一商店墙上。

⑤《清嘉庆八年十月休宁县知县曾守一严禁私棚民入山垦种、永杜后患告示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龙田村一商店墙上。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第24页,《左都御史唐音等为安徽休宁署民程元通呈控棚民占山扰害事奏折》。

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第28页,《护皖抚鄂云布为申明捏控棚民杀伤人命等情系程绍兰主使分别定拟事奏折》。

犯时,何应松才在四天后发出签票,并遣兵房汪玉芳等差胥役程高、程美、孙陞、王高、章瑞、凌禄六人,前往左垄村,拘捕原被告送审发落。

十六日,籤。

特授休宁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何[应松],为据投报明事。据卅三都五图乡约王文灼等具控汤得万等纠众强垦等情,并据王光芳等控同前由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行籤拘讯究。为此,仰役协同图捕该保,立即拘传。后开有人名等,限三日齐集赴县,以凭讯究。去役毋稍刻延干咎,速速。须籤。

兵房:汪玉芳、吕倍元;差:程高、程美、孙陞、王高、章瑞、凌禄。

汗开:

汤得万,系强种人;方长相、方长种、方长月,系盗拏人。

方兴旺,王天立、天进,系方长相捏名盗拏人。

本以为通过缉拿原被告到案,很快即可审讯结案,但时过一周后,休宁知县何应松竟毫不作为。三月二十三日,王志仃等不得不第三次呈控,恳请“严拘棚头汤得万,研讯究拟,逐匪安良。”无奈何应松一再耽搁延误,尽管吴义山、汤得万和张东等被告人已经相继投案关押,并被责成尽快交出方长相。但吊诡的是,直到本案于嘉庆十九年初结案,首犯方长相都未被缉捕归案。吴义山、汤得万、吴仓荣等棚头则不断率众入山搭棚,棚民则蜂拥进山垦种,并酿成吴义山身故、方长种身亡等命案。在连续14次呈县告状得不到实质性解决的情况下,王志仃等被迫于嘉庆十七年八月初一日呈禀徽州府,叩请徽州知府侯奉宸“按例肃法,迅赏飭县,先行驱逐,再恳提案,严究详办。”为此,侯奉宸还专门签发牌票,催促休宁县尽快办理。《牌票》云:

初九日,府牌为串骗强垦等事。案据该县民王志仃、方栢时呈控汤得万、吴玉堂等贿串惯召棚民之张东,主使无业之长相捏名伪造出租,强将树木扫砍起棚,霸种为害等情一案,久经批飭县严究具报。嗣据王志仃等具呈,即经严催去后,迄今未据究报,玩延已极。前据王志仃等以讯不符例等事,具呈前来,除批示外,合行抄词檄飭。为此,仰县官吏,文到立将讯明缘由,按照定例,即就现犯究拟具详。一面押拆棚座,即行驱逐回籍,具报。事干棚民扰害,毋许逗遛纵延,有干提究,未便切延。

荒唐的是,何应松在收到侯奉宸签发的牌票后,不仅未能迅速果断捕获方长相归案,反而次第批准了汤得万、吴仓荣、吴玉堂和张东等以患病名义保释出狱。八月二十四日,徽州知府再发催牌,痛斥何应松“玩延已极”,并令何应松等,文到之日,立将讯明缘由,按照定例,即就现犯究拟具详,“一面押拆棚座,即行驱逐回籍,具报。事干棚民扰害,毋许纵延滋事,致干未便。火速,火速。”次日,何应松堂谕汤得万、吴仓荣,责令其取具限状,依限退山,同时仍令汤得万、张东等交出方长相具取限状,限定其十日内交出隐匿方长相,一并送查。

然而,九月初二日,在久候未审、棚民未被驱逐、主犯方长相迟不交出的情况下,王志仃等暗中指使王永沛、王永汗、方大斗、方小斗、方珠等带领数十村民,强行登山,燃放烟枪,抢去棚民苞芦约100余担和其他财物,殴伤棚民帮夥10余人,并致李广田、陈少芳受伤沉重倒地,吴仓荣等因躲避及时而免遭不测。据其事后归棚清点财物时,发现并呈报计被王永沛等抢去“布絮被六条、猪油十余斤、盐四十余斤、大小锅十口、布短袄十一件、布长褂十六件、布夹袄五件、布短褂十一件、大小饭碗八十个、鞋袜二十双、布马褂十件、布(库)[裤]十六条。”讼案不仅未得解决,反而案上添案,形势非常严峻。

这次事件成为棚民反诉的一个转折点,王志仃等自觉事大难遁,遂于九月十三日至十月初三日向县禀呈,一方面极力捏称此案系棚头吴仓荣自导自演、“做案飞诬、妄希蔓延”的苦肉计,一方面联合方姓族长方栢时和方长环,同方长相、方长种、方长月三位不肖支丁切割,自称“身族不肖支丁方长种,自恃充过

禁卒,熟识衙门旧夥。伊弟长相、长月等违禁召异,合村查知。……长种毒心未泯,捏词架耸批录。切合村山场,方、王二姓养命之产,种与伊弟长相、张东等盗租棚匪,当经身等两姓破家倾产,垫价缴批。”被告棚头吴仓荣等亦从中嗅出信息,于九月十八日呈禀徽州府,恳请“飭吊凶械,按究赏追命本”,搬运叔父吴义山尸体回籍安葬。方长种则于十二月初八日呈控徽州府,称方长月并非“用绳自勒身死”,而是由王永汗和王永沛等“拥门凶逼,立刻毙命”,并哭求知府“恩严迅飭按办,实究虚坐伸冤”。

在原告纷纷互控、虚实难辨的背景下,何应松却虚与委蛇,每呈必批,但依然拖延不办,或办而不果。徽州知府侯奉宸在接到吴仓荣诉状后,于十月初三日再发催牌于休宁县,连用两个“火速”语句,痛斥何应松一拖再拖之举为“殊属违延”,责成其“文到立将前案讯断缘由,刻日议拟详复。一面差拘王永汗等应质人证到案,查照摺词情节,逐一确查究结,具文详府,以凭察夺,毋得迟延滋讼,致干未便。”徽州知府以这样的口吻和文字严斥下级,足见何应松之应急与应变突发事件能力之低下。

此后直至嘉庆十八年六月十三日,王志行、方栢时和方长环等又分别向休宁县和徽州府连续呈状控禀13次,其间,何应松亦从嘉庆十七年四月签票中责令“迅将汤得万、吴仓荣棚座刻即拆毁下山”,到准其秋收后拆棚回籍,再到汤得万、吴仓荣等不断立限状,请求“宽限十日”被准。同时又判王志行等垫价银432两,并为棚民提供拆棚回籍盘缠银100两贮库。何应松不断退让,予以批准,虽亦派役拆棚,但差赴该山,仅将各棚茅草掀下,并留二大棚不拆,亦未驱逐棚民,致差回次日,汤得万等即将原草盖上,“强占棚座,三奉押拆,三次复搭”。不仅主犯方长相依然未捕获到案,甚至连另一棚头吴义海亦因病重被其侄吴景堂抬回怀宁原籍医治,并称病拒不到案,讼案再次陷入僵局。

六月十五日,王志行等忿而前往安庆,以“违例抗断、旋拆旋搭、号提究逐事”,向安徽巡抚越诉。七月初三日,再向两江总督府呈控,案件由此升级扩大。

安徽巡抚胡克家和两江总督百龄接到控状后,分别批示并牌令安徽按察使广泰迅即查明案情,“土棍、棚民盗租强占,均干禁令,仰安徽按察司飭即勘讯明确,分别拟逐具报,毋任久踞滋扰。”

八月二十日和十月十三日,广泰先后札令徽州府和休宁县,要求“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刻日即齐一千人证到案,查照有无纠众持械逞凶?土棍张东等如何串诱盗租山业?差役孙陞等有无受贿抗庇?并究明王志行果否勾差将吴义山锁押班房,凌虐毙命?复嘱辣王永汗持械凶伤李广田等,务得各确情,录取切供。一面勘明,各山棚概行拆毁,押逐妥拟,详候察办,毋再徇纵刻延,致干未便。切速,切速。特札。”

然而,宕延近一个月后,广泰不仅没有收到徽州府和休宁县办理案件的任何回复,反而等来了棚头吴义海为其族兄吴义山并非病故而是被王志行勾结差役“锁押班房,凌虐毙命”的翻案呈控。十一月初五日,广泰再次札催徽州府迅速查明案情,“务得各确情,录取切供。一面勘明,各山棚概行拆毁,押逐妥拟,详候察办,毋再徇纵刻延,致干未便。”

面对案情的不断激化和安徽按察司、徽州府等上司最后通牒式的札催,何应松深感事态严重,不得不于十一月十一日开具《红单》,责令原差孙陞等每人各带副役2名,合计共36名差役,于十四日起程,速赴左垄村笋蔑坎等处山场,协同该保,立将吴仓荣等棚厂分别拆毁净尽,押令退山。限三日内,先行禀报,并申明纪律,“头役一名不到,责革枷示;副役一名不到,或托故潜回,责在头役名下,重处四十,仍革役,决不姑宽。”同时,将吴仓荣等提齐带县,以凭察讯究逐。

尽管何应松迅将吴仓荣等棚头讯断给领完案,山上棚厂全部拆除,聚居棚民亦大多被驱赶下山,但主犯方长相还是未能抓获,储友成是否抢物被烧身死,差役孙陞等是否受贿、如何受贿抗庇等问题,却依然未得讯明。因此,嘉庆十九年二月,王志行第40次也是最后一次具禀,并由王大成抱呈,痛称:“徽民遭殃,惟棚为最。棚害之惨,惟休益深。自嘉庆十二年邑民程元通违[为]匪扰害,赴部控逐,当奉前巡抚初[彭龄]奏定新例。嗣后,徽、宁、池三府,如有盗租山场者,与受罪科军流,租价入官。棚民立时押退,

法至严也。”叩请休宁知县依照嘉庆十二年《棚民退还山场章程》新例,将所有棚民全部驱逐回籍,退回山场,彻底根除棚民之害。但包括左垄村在内的休宁县暨徽州府乃至全国其他棚民聚居之地,除个别地区外,依然没有从根本解决这一问题。

左垄村这起土棚互控案的影响巨大,在该案结案之后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十月,御史孙世昌上奏嘉庆皇帝,请求议准并严申章程。嘉庆帝为此而钦颁上谕,责令“安徽徽州府属棚民,于嘉庆十二年议定章程,以租种山场契约年限为断,限满退山回籍。其未载年限者,亦不能过十年,迄今已届年限。据该御史奏,该处老棚不退,新棚日增,恐限满棚民仍在彼占种滋事。著康绍镛督饬该地方官详查,现在棚民业经限满者,概令退山回籍,仍按年造册,报部查核。再,棚民限满,地方官延不查办,应予以议处。如从前未经定有处分,著该部明定处分。奏准后,由该管上司照例查参。”^①尽管我们尚无法得知孙世昌关于严申议准徽州棚民限满退山回籍的奏疏是否直接受到左垄土棚互控案的影响,但作为嘉庆十二年《棚民退还山场章程》之后,至嘉庆二十一年清仁宗谕批孙世昌奏疏之前,左垄发生的这起土棚互讼案是极具典型意义的,这或许正是道光《祁门县志》特地将“御史孙世昌奏申禁徽属棚民垦种”^②列为徽州府处置棚民问题三件重要大事之一的原由吧。

四、处置土棚纠纷与诉讼中基层官员的应急应变能力及社会生态

从左垄村土棚互控案的处置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休宁县知县何应松确实存在应急和应变能力不足、处置不力、执行不果等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同样处于棚民蜂拥入山开垦的皖南池州府、宁国府和广德直隶州等地,为何在处置棚民问题时没有出现徽州府暨休宁县这样引发土棚双方的强烈反弹?入山搭棚数量和棚民总数几近相同的歙县,甚至远远超过休宁县的祁门县,在处置棚民问题时,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休宁那样,在短短五年内连续发生两起大规模的土棚互殴命案,进而导致赴京、赴督抚等越控案件?

要想回答和解决上述问题,我们不能不将视野转向徽州府外,并面向徽州府属其他五县挖掘更多史料,以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皖南地区各府州、徽州府属各县基层官员的应急应变能力及社会生态差异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寻找符合历史事实的答案。

刘伟曾将清代官方对棚民问题的应对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清代前期的安棚与驱棚阶段,二是清代中后期安歇棚民法的延续与演进阶段^③。尽管这一阶段划分法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就清代徽州棚民问题处置政策过程而言,嘉庆十二年中央王朝处置程怡仁京控案件之后,由安徽巡抚初彭龄制定和颁行的《棚民退还山场章程》,无疑是清代棚民政策一个分水岭。下面,我们拟以此为例,对徽州与宁国二府、徽州府属休宁县与其他县域官方及民间社会处置棚民问题的举措及其社会生态,做一比较分析,并借此探寻导致休宁县棚民为害最烈和处置失措的深层次原因。

其一,处置棚民等突发事件等社会问题,需要地方官府的主要官员具迅速判断、果断决策、敢冒风险和勇于担当等过硬素质与能力,还需要他们了解造成土棚纠纷诉讼乃至争执斗殴的各种复杂因素与彼此诉求,因地制宜地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嘉庆十二年二月发生的程怡仁赴京越控案件的处置上,安徽巡抚初彭龄奉上谕查办时,就提出了“选派廉明晓事文武大员前往查勘,或设立禁约,责令逐渐迁移;或勘定界址,就近妥为安插”的建议^④,并从安徽全省抽调安徽道杨懋恬和庐州府通判高廷瑶等精干官

① 《清实录》第三册《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百二十三,嘉庆二十一年十月甲辰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272页。

② 道光《祁门县志》卷一《舆地志·沿革》,清道光七年刻本。

③ 刘伟:《清代棚民问题及其社会应对》,安徽师范大学2018年中国史学科硕士学位论文。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员,前往查勘。高廷瑶在整个案件的调查中,勇于担当,先是阻止了杨懋恬等武力擒剿棚民的行为,继则偕休宁知县李蟠根,轻装前往浯田岭,并劝李蟠根暂留古庙,“万一变生意外,则我先之,君后殿,无难避矣。”高廷瑶遂只身入村,保甲来迎,“棚民跪谒者踵至,其远近男女纷纷千百人夹道欢呼,绝无惊惧情状。”次日,召棚民晓事者十余人,至前“问以早岁来山佃田几人,几许佃作,凡几辈也,皆一一以对。”完全没有违和感,李蟠根甚至叹云:“此即太平景象也。”^①高廷瑶这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勇于担当,深入棚民之中查勘棚民的真实状况之举,为初彭龄制定和颁布《棚民退还山场章程》,因地制宜制定针对性较强的处置棚民政策提供了全面而真实的依据。

道光三年(1823),刚刚出任宁国府知府不到二月的梁中孚,在深入调查后,制定了《除弊兴利谕》,对物产丰饶的宁国府之所以“俗敝民贫”的根源进行诊断,并得出结论,“一在棚民之滋扰,一在吾民之懒惰也。”仅就棚民滋扰的处置和治理而言,梁中孚坚决执行嘉庆十二年钦奉上谕颁行的《棚民退还山场章程》,“严行禁止,招集棚民,定有罪名。”并与宁国士民和土棚人等约定,“凡有山业之家,其曾受租开垦,定有年限者,限满之日,即行赎回,毋得违例再租。其未经开垦之山,概行禁止招集棚民,即以今年九月为始,如有故行再租招集开垦,一经发觉,定当按律治罪,决不宽贷。非本县与尔等为难,实为尔等除去祸根。其棚民中已买有田产、入吾籍者,即为吾民,如各安分守业,本县万不歧视也。”^②继而他又颁行《保甲章程》《保甲条约》,申明:“棚长稽察棚户,其棚户散居各村者,许就近村长约束。如有犯条约者,该棚长邀同村长禀究。”^③“禁招集棚民,开垦山场”^④。宁国府的棚民问题,经过梁中孚有针对性的断然处置而得以顺利解决。

再以徽州府黟县为例,早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黟县知县顾学治即颁布了《永禁保县龙脉示》。嘉庆十年(1805),知县苏必达又颁布《禁水口烧煤示》,并先后严惩了江西窑匠邹国仲、租山与棚民烧煤的李大坤和棚民汪宾。嘉庆十二年《棚民退还山场章程》实施后,知县吴甸华于嘉庆十六年(1811)七至十月,连续颁布了《禁租山开垦示》和《黟县禁开煤烧灰示》。在《禁租山开垦示》中,吴甸华棚民租山开垦的六大危害,尤其是对吏治之害,吴甸华一种毅然担当的勇气,声色俱厉地指出:“国法俱在,亦宪典共遵。棚民何难驱逐? 顽梗何难惩治? 但平日则地保为之容隐,临事则差役不善缉拿,在官长素尚精明者,自能究办。倘稍涉因循者,便致颺预,实由租山之人致此宕案之弊。”为此,吴甸华严令“合境人民共祛其害,即永享其利,何所惮而不为? 何所徇而相忍?”并郑重承诺并警告道:“本县言之既切,行之必诚,慎勿阳奉阴违,自治伊戚。”^⑤这种果断与担当精神,恰恰是何应松所缺乏的。

反观休宁县知县何应松,在处置左垄土棚互控案件过程中,始终优柔寡断,一再向各方妥协退让,不断宽限棚民拆棚退山回籍的时间,并且直至案件终结,亦未能将主犯方长相缉拿归案,并绳之以法,以致酿成3人身死、多人重伤的惨剧,直接导致了土棚双方越控至两江总督、安徽巡抚和安徽按察使等事件的发生,屡屡被徽州知府和安徽省级官员斥责的结局。其实,何应松完全可以像宁国府及徽州府属歙县、祁门县、婺源县和黟县那样,对发生在嘉庆十二年之后的土棚纠纷和互控案件,依照《棚民退还山场章程》的规定,予以迅速果断处置。毕竟原告主告王志仃等土著村民的诉求,无非就是要求遵照“嘉庆十二年,奉定新例,‘嗣后如有盗租山场者,除与受分别科罪外,租价入官,棚民立时拆退。’”只要处置得法及时,后续接连发生的连环案、案中案,甚至土棚3人丧命案,完全可以避免发生,更不会出现土棚双方的越控现象。但犹豫不决,遇事推托,最终使何应松错过了处理这起案件的最佳时机,成为地方治理中无法消除的隐患。

① [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引自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六册,黄山书社,1997年,第25页。

② 道光《宁国府志》卷十一《晓谕·除弊兴利谕》,清道光五年刊本。

③ 道光《宁国府志》卷十一《晓谕·严行保甲谕·保甲章程》。

④ 道光《宁国府志》卷十一《晓谕·严行保甲谕·保甲条约》。

⑤ 道光《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竭》,清嘉庆十七年刻本。

其二,地方官府和基层社会生态,直接影响了包括棚民在内的突发事件的处置结果。何应松和沈南春皆曾在婺源知县任上得力地处置过类似民间纠纷与诉讼等突出社会问题,为何他们在分别调任休宁知县和六安直隶州知州任上处置纠纷与诉讼等问题时畏手畏脚,沈南春甚至遭到了被革职的结局呢?显然,休宁县和六安直隶州的官场与基层社会生态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因素。诚如范金民所指出的那样,“六安地方缙绅势力特别强大,同治年间在那里当过知州的高廷瑶在历事后深为感慨地说,地方官稍有短处把柄被士绅掌握,无有不败者。沈南春的落职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①

相对而言,婺源县的官场和基层社会生态,比之休宁县则相对较为宽松。在处置与休宁县毗邻的花桥吴氏宗族棚民问题时,婺源历任知县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且与当地基层社会组织互相配合,彼此互动,从而使包括棚民等问题能够得心应手地加以解决。从嘉庆二十三年(1818)三月婺源知县周之桂颁布《阖族禁止开山告示》开始,到道光九年(1829)二月,先后有周之桂、吴公祖、孙敏浦、朱元理四任知县,一任徽州知府敦泰,分别于嘉庆二十三年四月、道光元年(1821)三月、道光八年(1828)七月和道光九年(1829)二月,连续颁布严禁告示,并在告示之后附有花桥吴氏宗族制定的《公议加禁》和《外村附约条规》等禁约条规,婺源官方告示与花桥宗族禁约彼此互动,且带有明显的预防性。因为在嘉庆二十三年第一次禁后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即先后有周社一和朱嘉生等立下退租山约,詹福寿、宋之诤和吴西等立下“永远不得挖种戒约”^②,或甘结限约,整个处置过程层层推进,问题一一得到妥善解决。

而何应松自嘉庆十六年调任休宁知县后,直至道光四年离任,却始终以一位文弱书生的形象出现,并未施展其果敢干练、勇于担当的才干与能力。据同治《南海县志》载:何应松,字聘君,号云涛,广东南海县人,历任颖州府同知和颍上、望江、婺源等县知县,嘉庆十六年题补休宁县知县,道光四年调署灵璧、凤阳二县知县。在婺源知县任上,何应松治理妇女自杀图赖,止住刁风,颇有政声。但因不善治理,卸任时却“亏空千余金”。何应松在休宁知县任上前后长达14年,《南海县志》称其治理休宁“先后视事,殆及[十]四年,百务咸修,四郊无事,得以暇日纂邑乘、修书院、添膏火,以振文风。其仕皖,历任剧繁,宦绩于休宁最著。”但又云其“以儒素起家,虽为承乏之员,不肯苟同俗吏”^③。尽管何应松在休宁执政总体上是文化教育上政绩突出,但在处置棚民问题上则是不合格的。因此,在其主修的《休宁县志》中,对棚民问题几乎只字未提,这或许是他心中无法挥去的阴影。休宁民间“健讼成风……两造告状,必差皂快拘提,事无大小,而皂快视为奇货,需索酒食路费,不饜不止。”^④又有讼师奸棍从中唆讼,“凡地方多有奸棍,结为夥党,专以兜揽词讼、窝匿逃盗、骗害愚弱、唆耸斗殴、挟制官吏、假公逛上、造设诬谤为事,非清廉执法、彻底无私者,未有不畏其口而曲意容隐以纵其恶,莫敢过而问之也。”^⑤“甲乙相讼,县官则视其金钱之少多而操其长短。”^⑥加上胥吏、衙役各种陋规苛索,如户丁编审时的公堂礼、册里礼、造册礼等苛索,“吏胥、衙役分索规礼。”^⑦“百姓既要完粮,又要许多贴费,稍不遂欲,锁押难堪。”^⑧休宁地方官场这种长期形成和积累的各种陋规与贪腐生态,使何应松在处置左垄土棚诉讼中难以驾驭属下胥吏,从容施展其权力和能力。左垄土棚互控讼案主犯方长相之兄方长种,曾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充当宪案禁役”,熟悉衙门关节,方长相正是恃其庇护而得以长期隐匿。受遣往左垄拆除棚厂的孙陞、王高等差役又收受汤得万

① 范金民:《清代徽商与经营地民众的纠纷——六安徽州会馆案》,《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② 光绪《环溪吴氏家谱》卷四《山案禁约》,清光绪二十九年木活字本。

③ 同治《南海县志》卷十三《列传·何应松传》,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④ [清]廖腾焯:《海阳纪略》卷下《申飭原告自拘示》,清康熙刻本。

⑤ [清]廖腾焯:《海阳纪略》卷下《为条陈编审并各款通详两院文》。

⑥ [清]廖腾焯:《海阳纪略》卷下《两江总制傅、安徽巡抚江详文》。

⑦ [清]廖腾焯:《海阳纪略》卷下《禁革祭祀陋现告示》。

⑧ 同治《[休宁县]裕课清累全案》,不分卷,清同治十三年休宁县敬谨斋刊本。

等棚头贿赂,卖放同伙;地保王祥瑞私受重贿,暗受嘱托,“差利匪财,匪倚差庇,交相济恶”,以“致匪多金贿差,致差弊夺官权”。如此贪贿公行的官场和险恶的基层社会生态,对何应松的行使权力以及处置土棚控案、执法拆棚、驱逐棚民退山回籍等诸多举措,形成了严重掣肘,并最终导致土棚矛盾激化失控,酿成命案,引发越控,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深思的。

结 语

纵观休宁县左垄村土棚互控案之过程,以及由此反映和暴露出地方官府与基层社会的贪腐险恶的生态环境。我们不难发现,本来棚民进入山多田少的徽州山区进行开垦开发,或种植苞芦,或开煤烧灰,“其初起于租山者之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户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鹜,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余年至三十年。”但“在棚民携本图利,究与霸垦强占不同。若土民不将山场租给,则异民又何由托身?所有召租之山,大半祖遗公业,股份本多。族内贫乏不能自存之人,因此盗召租佃。”^①尽管棚民的无序开垦对徽州山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以致“山遭残废,樵采无资,砂石下泻,田被涨荒”^②。但棚首和棚户投入了巨大资金,“又不甘舍本而去,藉以迁延。其内有一二强悍者,因之斗殴争闹,兼有凶横本地民人从而焚棚抢苗。是违禁滋事,其咎不尽在棚户。”^③因此,土棚之间“构衅滋讼,事必不免”^④。围绕土棚纠纷与诉讼,往往视当地官府和基层生态的好坏而呈现出不同的情态,“黟县、婺源历久,土棚相安,从无控案。”^⑤但休宁县的控案较多,且因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府吏胥苛索等积弊和陋规的顽固存在,使得休宁县的土棚纠纷与诉讼更加错综复杂,以致酿成命案,不断发生越讼甚至“京控”事件,从而激化了土棚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嘉庆年间休宁县三十三都五图左垄村土棚互控案,给我们提供了深刻教训。这一事实表明,基层社会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地方官府主要官员的素质、能力与担当,对事件的处置是否果断、得力,能否与基层组织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和利用,进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宗族、乡约及保甲等基层组织的功能与作用,成为地方治理和基层社会能否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忽视了地方官府和基层社会生态的治理,很可能会给国家治理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和后果。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② 《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宁县知县郑泰严禁召棚民种山宁民杜害告示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龙田村一商店墙上。

③ 《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宁县知县郑泰严禁召棚民种山宁民杜害告示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龙田村一商店墙上。

④ 嘉庆《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竭附附禁开煤烧灰事》。

⑤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